

# 对<sup>寅</sup>马老生平的认识及点滴回忆

潘序伦

(1)

我于今年夏秋之际,接到北京大学经济系“马寅初生平研究组”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先后来信,要我写一些“与马老接触中的见闻感受”,并恭承北大经济系来函称我为马老的“知友”。我对于这一称号,虽觉愧不敢当,但我在前后六十年中对马老生平的认识,也确是满怀深情,总有一次倾吐的机会。现在我也已到耄耋之年,确也是我倾吐衷情的最后机会了。

不过我又想到,马老一生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作出有关世界经济学术和国家命运前途等正确见解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新人口论》),已在国内外多种中、外文的刊物上弘扬建设,几乎已普遍深入全国人民群众的心坎中,将永不忘怀的了。我所读到的,就有《人民教育》、《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人民画报》、《北京大学》(校报)、外文《中国建设》,和最近出版的《马寅初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书刊。至于解放前的《马寅初论文集》,我反都好好学习保存过的。马老在解放前的三十年里,一直担任了旧中国经济学社社长之职,他和我们中第



与理事所拍摄的照片和他所给我的事事书信，连同我所保藏的《马寅初讲演集》十余册，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被红卫兵焚毁干净，一物无遗。因之我此次为马老生平写这篇《回忆稿》，对于已在各种刊物中宣扬无遗之事，一概不再赘述，而只讲一些我与人对马老的认识，并回忆我和马老的私人友谊而已。

至于上文讲到马老著作在我国南方被毁的痛史，已记到了北方全部保存的好消息。马老的女婿徐锡革同志去年三月来函告我，马老在解放前的著作，在他府里全部尚有一种。<sup>徐</sup>徐同志说：“这要感谢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照顾，在文化大革命浩劫期间，假如没有周总理的保护，反北大校长的家里，决不能免于被抄毁的呀！”

## (2)

闲话少说，就写正文。我只知马老是浙江嵊县人，不知道他是生于绍兴，长于嵊县的（见《经济学动态》1980年8期朱正真撰《马寅初》）。我在多年前曾到过嵊县，也读过王羲之所写《兰庭集序》中的“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一语。我看到嵊县全境是在万山峻岭之中，但到处是茂林修竹，郁葱葱，显出



一股文雅秀丽的境界，古语所称地灵人傑，就应在马老身上了。他的性格就是坚强刚毅，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若把此语移赠于马老，作为对他百岁大庆的祝词，我认为是十分适当的。全国人民（极少数反动分子除外）想来都会同意我这种想法的。

我又早料到马老一定会长寿百岁的，因为他的性情虽然非常坚强，<sup>硬而</sup>但并不脆弱，他的全身不是用玻璃做的，而是用<sup>普通</sup>钢铁铸成的。他性情开朗，对于毁誉，都不放在心上。因之他的体质结实，同时又喜爱运动，更喜登山。在他七十岁以前，步行百里，不以为劳，西湖的南北高阜，在他看来有如平地，这是马老长生不老的基础（我在七十岁以前也能作马老的跟班）。所可恨者，就是马老在人民大会公开发表的为党、为国、为民，非常正确的许多主张，尤其是关于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综合平衡和比例发展等与国家前途命运大有关系的问题，在康生和陈伯达等人愚昧荒谬的批判下，使马老含冤负屈逾二十年，以致他的心情无论如何开朗，也不免受到重大损伤，否则马老今天的健康情况，必然会如（或超过）广西省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104岁的老妈子那样，能远途来京出席人大会议，侃侃而谈。马老一肚子的富国利



民的良策,对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当有更卓越的贡献。前年党中央实事求是地为马老作出了平反的决定,当然使他心中感到党的正确、光荣和伟大,感到无限的欣慰,所以我预祝马老在后代同堂的精心护理下,定能恢复健康,寿登一百数十岁,是不足为奇的。

## (三)

马老长我十一岁,他在1914年以《纽约市的财政》论文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而我则在1924年以《中美贸易论》的著作获得与马老为先后同学的博士学位。马老在1916年,就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我那时还是上海浦东中学的学生。按以这样的资历,我应当算在马老的徒子徒孙之列,可是我后来竟与马老以“老兄”、“老弟”相称,则因我们<sup>在</sup>解放前的“中国经济学社”中,他是社长,我系被推举为常务理事。马老那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经济委员<sup>会委员</sup>长,而任学社的副社长<sup>的</sup>黎澍是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还有好几位理事,如金国宝、李叔时、章乃田等都在上海任大学教授或银行经理。我当时也担任了马老与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合办的上海商科大学的教务主任,以及那时办在上海的国立暨南大学所附设的商学院院长,因之中国经济



学社社长马老为上海理事们的便利起见,经常把“中国经济学社”的常会在上海举行,有好几次就在上海淮海中路(那时是法租界的爱多亚路)1285弄17号我的寓所内举行。由于社内同是理事的关系,我就大胆地与马老以兄弟相称起来了。旧中国<sup>经济</sup>会计学社的理事,除上述在沪各理事外,还有担任<sup>前</sup>国民政府<sup>主计处</sup>统计局局长的刘大钧,担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的陈长蘅(闻还健在,住在上海)以及立法院<sup>立法</sup>委员<sup>人</sup>銜挺生等。至于理事会章程和社员名单等,则我家已无卷可查,我也年老健忘,记忆不清了。

我今天记忆犹新的事是旧中国经济学社的社员常年大会。马社长对于社员年会的举行总是亲身尽力布置。据我记忆所及,年会曾先后在山东济南、广东广州和湖南长沙等地举行。参加社员大会的<sup>社员</sup>每次都有一二百人,除在会各自宣读经济学方面的论文<sup>人</sup>而外,马社长还领导了社员们到当地参观考察,也总受到当地政府和社会知名人士的热情招待。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老去了重庆,担任<sup>前</sup>国立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我曾被他邀请去该校作过几次关于会计问题的讲演,并接受了重大商学院兼任教授的聘书。可是我那时正忙于重庆会计师事务所的职务,在重庆市区和郊区北碚办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校，并在重庆市区办了专科市区班和六所会计补习班，因之我未能经常到重大去授课。

那时日寇飞机日夜轰炸重庆市区，使市区几乎全成灰烬。马府全家都避到离市区十余公里的哥乐山，赁屋暂居（哥乐山是歌剧《江姐》里所说中美<sup>合作所</sup>联络处，实际上是禁烟屠杀共产党人的处所，但我对此是茫然无知的）。我那时患了严重的斑疹伤寒，住在哥乐山医院治疗。马老和马嫂经常到医院里来探望我，并知我生平有爱猫之癖，送来一只小花猫供我消遣，这样，我和我妻张蕙生与马老伉俪的私人情感更进一步了。

马老在重大任教时，就对蒋介石法西斯政权和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等危害国家命运之事，公开发表严厉的指责，因之不久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逮捕，转辗被送到江西和贵州某地集中营，我夫妻听到这种惨酷消息，心中悲愤交集。到了1942<sup>至</sup>1944年初，国民党受到了那时民主运动的压力，不能不把他释放，但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断绝他当教授写文章的一切可能性。我因他仍住在哥乐山，可能很不安全，国立大学不敢请教他了，他家庭的经济生活一度陷于困境。我也果有一夫不畏强暴的气概，敢于聘请他到我所创办的北碚



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担任财经教授，并请他带领子女一  
同住在夙素著名的北碚我院校舍居住。这样过了<sup>两年</sup>数月，  
被那时设在离北碚数十里青木关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  
C.C. 头领陈立夫所知悉了。他以教育部指令，命我去教育  
部见他。我去见他后，他用威胁的口吻，命令我立刻辞去  
马老在我校教授职务。我回校后用啼笑皆非的声音告诉了  
马老，他一笑置之。那时已是1945年的五月，日寇已有无条件  
投降之讯，因之我也不以陈立夫的指令为意。果然不到八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于九月八日乘美国的飞机到上  
海来接管日军投降的军用飞机回到上海，马老也就回到南<sup>上海</sup>京，  
仍任他的国民政府主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的冗职去了。

到今天，北碚立信<sup>会计学校</sup>的毕业生，大都成为今天服务于四化  
的骨干分子。他们和我、我妻张蕙生，以及钱素君、管锦康诸位老师相  
见时，还经常谈起听到了我国经济学界巨星马老的讲演和授课，大  
家津津乐道，引以为终生莫大的荣幸。我也认为我校是大专院校里  
的一只小卒，能与全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同样亲身受到马老的教  
诲，难道不也是我终生的荣幸吗？！



(4)

时在1943年七月,我的学生顾准在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学校工作了十三年,突然向我辞职,声称会计工作本不是他的宿愿,他及放弃了在我所每月三四百元银币的收入,到苏北去投奔陈毅老总的新四军干革命。到1949年五月上  
海解放,顾准随着陈老总到了上海,首先就来看我,要娶给我以什么市人民代表的名义。我当时封建思想余毒很深,自己认为已一度做了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吏,不宜再去做再醮之妇,所以坚决拒绝,闭门在家专心从事会计编障工作。

当时马老任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的私邸和我家相距很近,我们夫妇常到他府上和马老马嫂及诸位世兄妹兄召闲谈。马老有时到我家回访,也以顾准对我之言,劝我为共产党政府做些工作。我仍以答复顾准之语回答马老。我在党三十年的长期改造和教育之后,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能以我会计的工作,拼着老命,总为“四化”伏出一类贡献。

那时马老对我说起他的《新人口说》。我听了欣然有味,但当他说到“我的人口说,既不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说,也不是马恩的人口说,而是我马寅初的人口说”。我心中十分佩服他



的高兄（因马克思从未谈过人口过剩和节制生育<sup>的</sup>问题）。但我觉得他说：他的人口说不是马克思的“马”，这句话可能引起当时政治上的麻烦，因我那时在上海政协的大会上，听到中共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发言，就是说人多力量大，所以人口越多越好。还援苏联之例，提倡光荣爸、光荣妈，多生子女。同时他还说：“每畝田密植可收获稻谷数千斤、数万斤，吃饭不要钱，粮食多到吃不了，怎么办”等胡言乱语。我思柯庆施讲这话，必有他的后台靠山。因之我觉得当时马老主张节制生育，恐发生不良<sup>对他不利的</sup>后果。我虽自以为胆子不小，骨头还硬，但比起马老来，我倒底是个胆小鬼、软骨头。我力劝马老暂时不要发表《新人口说》的主张，但马老仍以坚决的口气对我说：“我的主张，必须公开发表，没有什么可怕的。”此后不久，就听到马老在北京大学受到批斗、撤职的不祥消息，浩叹不已。在他被批判之前约一两年，马老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身分到浙江省去实地调查人口增长和生产跟不上的情况，作为他向人大作汇报的基础，不料就因此引起党内“贾大空”们愚蠢无知之徒的围攻，以致马老节制生育的正确主张遭到了廿年无情的打击，今日追思，不胜浩叹！

我读《唐诗三百首》，其中有一首歌颂韩愈所撰的《平



淮西碑文》的诗，诗中有四句云：“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顾书万本读万遍，口角流津右手舐。”马老的《新人口说》主张节制生育这一旨，真如唐诗所说，已普遍渗入人们的肝脾！按马老子婿徐同志来信说起：马老《新人口说》一书，初由北京<sup>出版社</sup>大学印一万册，顷刻售尽。继由人民出版社续印十万册，几天也就销尽，我托他代我买五册，寄与我不送急需诵读的同志，回信说，经四处搜索只买到四册寄来，于是再加印十二万册，想来又已售尽了。这种情况，比唐代诗人的诗所说“顾书万本读万遍”（唐代还没有发明印刷术，书本都是手抄的，故云），其普及性<sup>何止</sup>何止百倍。何况节制生育（我国现时改称“计划生育”，其实意义并无不同）的浪潮已遍及全世界各国。马老的《新人口说》理该译成各国文字，使遍及全世界，而党对马老所坚持的人口说真理已给予错误批判的改正，使这一真理成为廿一世纪救世真言，这可算是马老晚年的第一快慰事了。

长期以来，我和马老彼此都因在政治方面具有深重顾虑的关系，音讯隔绝，鱼雁不通。直到大约两年前，有位前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sup>沛</sup>叶锦婴同志，突然驾临寒舍，声称受了马老之托，来打听我们夫妻是否还在人世（在廿年动乱中，彼此都不知是



还是活), 我们方知马老伉俪都仍健在, 当即复信道贺。去年, 马老还命其子婿徐同志<sup>把他的</sup>赠我<sup>近照</sup>一张, 代马老签名盖章, 寄与我永保留念。我也寄去我夫妻的<sup>近照</sup>一张, 徐同志于1979年12月来信说起, 他在马老精神<sup>好</sup>时, 把我俩的照片交他看了, 他起先已不认识, 多予介绍后, 才恍然大悟, 哈哈大笑, 说“这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呀!” 我想今天如能烦请徐同志把此文所写<sup>的</sup>回忆点滴, 在马老有精神时, <sup>揀</sup>择几句向他介绍一番, 以引逗他再次向“这老朋友”哈哈大笑一番, 也是以实际行动来祝马老长寿无疆的一法也。

潘序伦, 1980年10月在老病不断中写于上海。